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4.003

## 孔氏家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下)<sup>①</sup>

冀玉珍<sup>a</sup>, 霍俊国<sup>b</sup>

(曲阜师范大学 a. 图书馆; b. 文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作为孔子之道的鲜明标志,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自孔子时代至北宋初年,孔子之学始终是儒学的基石,孔安国、孔颖达等后代学者更是承袭孔子之道,致力于阐释其学说,为儒学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孔氏家学中的经史子集著作及其人文思想,为儒学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丰富了儒学的内涵。最后,孔氏家学在南北朝、唐宋及其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恪守传统,修正异数,确保儒学不偏离孔子之道的轨道。清代经学的复兴,正是得益于孔氏家学数百年的坚持与修正。

**关键词:**孔氏家学;儒学;经学;理学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4-0015-06

### 四、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孔氏家学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学派不仅承载着孔子的智慧与教诲,更在历代孔氏族人的传承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儒学的内涵。正是这种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积淀,使得孔氏家学在儒学领域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关于孔氏家学对儒学的影响,学界较少关注。李学勤曾在《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一文中为此而叹惋。在笔者所见文献中,黄怀信的《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陈冬冬的《清代曲阜孔氏家族学术研究》、刘蔚华为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一书撰写的序文、陈以凤的论文《先秦时期的孔氏家学考论》《世业不替:先秦两汉孔氏家学中的诗礼传承》、史振卿的论文《论孔氏家学在古文〈尚书传〉形成中的作用》以及王钧林的部分论文等,都对这一问题有所研究。其中,刘蔚华对孔氏家学与儒学关系的论述尤为深入和明确。刘蔚华曾作过精辟的阐述:

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以后,不久便成为广为流传的显学。从此儒学开始沿着两条线索向前发展,一条由众多弟子

及后儒将儒学推向社会,发展到汉代,经过董仲舒的提倡和汉武帝的决策,儒学一跃而为官学,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是二千五百多年来儒学发展的一条主线。另一条是由孔子后裔坚守的孔氏家学,孔子之子孔鲤就是孔子的学生,其孙子思从幼年开始便受到了孔子家学的哺育,所著《中庸》成为儒家思孟学派的魁首,从此儒学在孔氏后裔中被作为家学相沿不废,不论儒学的历史处境如何,这条儒学发展的线索始终强有力地向前伸展着。并由此而烘托了儒风浓郁的地方人文——鲁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条儒学发展的副线,对儒学发展主线起着支撑的作用。当然,孔氏家学也是整体儒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它进行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必定会从另一个侧面和角度促进整体儒学的研究水平。<sup>[11]</sup>

刘蔚华认为孔子家学虽是儒学发展的副线,却又对儒学发展的主线起着支撑作用。

笔者赞同刘蔚华的观点,并认为其观点可进一步细化。结合孔氏家学的内容、儒学的时代特

收稿日期:2024-02-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孔府档案文学书写研究”(19YJA751017)

作者简介:冀玉珍(1975—),女,山东聊城人,法学硕士,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教授;霍俊国(1975—),男,山东聊城人,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孔氏家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上)》发表在《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色、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孔氏家学对作为官学的儒学的影响作用,具体表现为支撑、补充和修正三个方面。

(一)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孔氏家学的著述包括孔子本人的著作以及其后裔的著作。孔子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其著述自然是儒学之本。在孔子在世时,从孔子之学者“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众弟子<sup>①</sup>。孔子之后,孔子之作流传于孔门弟子,天下形成七十二子支流,为儒学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经秦焚书坑儒,但孔氏之书不绝如缕。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传孔子之作者甚众,如济南伏生、齐郡轲固生、淄川杨何、齐郡胡毋生、广川董仲舒、瑕丘江翁等。武帝独尊儒学为官学,尊孔氏之书为“经”,依五经立五经博士。此后,尽管儒学内部经历了古今经学之争、郑王之争、南北学之争,但孔子之作在儒学中的支撑地位始终未变。唐代还进一步完善了释奠孔子制度,凸显了孔子的尊崇,保证了儒学的稳固地位。

北宋初期,儒学延续了唐代经义之学的传统。然而,自宋神宗熙宁年间起至清代,理学逐渐兴盛,尤其以朱熹的学说为尊。元代更是将理学确立为官学。儒学实已分为理学和经学二支:理学“表面上自称孔孟道统的继承者,实际上所用力不是热情地拯救社会,而是理智地思考本体。孔子偏于伦理、社会、情意,宋学家偏于哲学、个人、理智。‘就退一步承认他们是儒家,他们也是受了佛学影响后的“新儒家”,而决不是原始的儒家的孔子的继承者。’既然理学异于儒家,完全是受佛学的刺激影响,宋学实际上是儒表佛里,那么宋学就不是孔孟道统的继承人,即使勉强承认其为儒家,也是骨子里信佛学的新儒家,而不是作为孔子传人的儒家”<sup>[2]40</sup>。更为显著的是,理学甚至用“四书”取代孔子所删定的“六经”<sup>②</sup>,“从而使‘四书’成为包括‘六经’在内的整个经学的基础”<sup>[3]</sup>。这种并不真正传承孔子之道的做法,使得周予同等学者认为理学不是“孔子的继承者”。尽管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儒学的传统,但其在理念、方法上的转变,使其与原始儒家及孔子思想出现了显著的距离。同时,既然理学以程朱之学特别是朱熹的学说为基石,那么孔子之学自然难以被视为理学的支柱。

经学方面,宋至元明时期的学者被周予同称为“经学怀疑派”<sup>③</sup>。这一派别自张敞的《七经小传》和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起,就开始“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去取舍儒经,解说经书”<sup>[4]304</sup>。有时,他们甚至将理学与经学相融合,将经学作为阐述思想理论的工具,使“理学思想均通过注释、解说、议论、引用经书的形式表现出来”<sup>[4]303</sup>。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引用了王应麟、司马光、陆游等人的观点,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皮锡瑞说:“《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而不鉴。《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埂。’……元佑诸公排斥王学,而伊川《易传》专明义理,东坡《书传》横生议论,虽皆传世,亦各标新。司马光《论风俗札子》曰:‘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陆游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sup>[5]73</sup>即便是程朱之学、陆王之学,亦多空谈义理,流于禅释之谈,而科举考试更是文字游戏,虚无蹈空。因此,宋至元明时期的经学,诸如朱子释经等,虽表面为经,内实否经,以理代经,经学实则凋敝之至,孔子之学亦难以真正成为此际经学的支撑。综合以上理学和经学两方面的考察,自宋神宗熙宁后至明代,孔子之学已并非为当时流行的儒学的支撑。

在清代,虽然程朱理学依旧占据着官学正统的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术的演进,众多学

<sup>①</sup>皮锡瑞《经学历史》言:“《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sup>②</sup>“四书”中虽有孔氏家学中《论语》《中庸》二书,然《大学》《孟子》的加入,实已取消了以往孔子独尊、支撑儒学的局面。

<sup>③</sup>周予同《孔子、孔圣和朱熹》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将中国经学分为十期,其中第八期称为“经学怀疑派崛起时期”,时间“约当宋、元、明三代”。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将经学分为四派,并据之分经学为四期,其中第三派即第三期为宋元明经学;皮锡瑞《经学历史》亦将经学分为十期,其中第八期宋“经学变古时代”与第九期元明“经学积衰时代”相合,约等于周予同第十期。刘师培和皮锡瑞皆认为,宋元明经学家为经学怀疑者。参见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刘师培全集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之“序例”及第二十三至二十九课、皮锡瑞《经学历史》之第八至九章。

者开始对其空疏之弊进行深刻的反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经学家,他们不满足于理学对经典的解读,而是主张回归“六经”,倡经学为儒学正统,重新探寻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他们深信,只有深入研究经书原文,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儒学的精神实质。同时,阎若璩、毛奇龄、惠周惕等学者也积极投身于经学的复兴之中,他们以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学识,对经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解读。不仅丰富了经学的内涵,也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更是进一步彰显了经学在清代的重要地位。这部庞大的文献总集将经部置于首位,无疑是对经学的一种高度认可和推崇。这也使得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经学,进一步推动了经学的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之学得以重新焕发光彩,成为儒学的坚实支撑。孔子的思想不仅为经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也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清代,孔子之学实又重为儒学支撑,为儒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孔安国与孔颖达的著述同样为儒学的发展撑起了一片天。《史记·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西汉武帝时期,鲁恭王在破坏孔子旧居时发现了古文《尚书》《论语》《孝经》等珍贵典籍,孔安国便“以今文读之”。这里的“读”即指解读、阐释之义。王国维引王念孙的话,认为:“‘自孔氏治古文经,读之,说之,传以教人,其后遂有古文家。是古文家法自孔氏兴起也。’……安国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读而传之,是谓‘以今文读之’。”<sup>[6]200-201</sup>皮锡瑞、孙钦善等学者亦引龚自珍《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实名》中的论述证明《史记》所言。龚自珍言:“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文读之,传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则与博士何以异?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则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sup>[7]464</sup>可见,孔安国不仅整理、保存了《古文尚书》《孝经》等典籍,更以今文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开启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分野。其开创古文经学的功绩,使他赢得了“古文家之祖”<sup>①</sup>的尊称。自孔安

国之后至刘歆之前,尽管古文经并未增设博士,在民间却广为流传,成为西汉末刘歆立古文诸经和增列博士的重要支撑。至晋时,古文经再次得到重视,以致“今文之师法遂绝”(皮锡瑞语)。关于古文经在民间的流传情况,王国维曾说:“自武、昭以后,先秦古书传世益少,其存者往往归于秘府,于是‘古文’之名渐为壁中书所专有。”<sup>[6]201</sup>特别是《古文尚书》,从东汉至隋,基本均为孔安国所传,这一点在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和日本学者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中都有所论述。

孔颖达所著《五经正义》在唐至宋初的儒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成为这一时期儒学的定法。皮锡瑞对此评价道:“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课,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sup>[5]65</sup>孔颖达《五经正义》不仅统一南北之学,更被奉为儒学圭臬。日本学者本田成之甚至认为,其意义不亚于汉代独尊儒术的历史地位。

要之,孔子之学作为孔氏家学的核心,自孔子在世起至北宋初年,始终是儒学的基石,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而在这一传承过程中,孔安国、孔颖达等人承袭孔子之道,致力于训释孔子的著述,他们的贡献不仅成就了一派或一代的儒学,更是对这一派或一代儒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孔氏家学在儒学发展中扮演着官学之外的重要补充角色

儒学如同浩渺的长江大河,波澜壮阔既得益于主流力量的坚实支撑,也离不开无数涓涓细流的汇聚与滋养。除了孔子之学、孔安国传承的古文经以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孔氏家学中的众多经史子集著作及其蕴含的人文思想,如《中庸》《孔丛子》《孔氏家语》《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东家杂记》《阙里志》《幸鲁盛典》等,以及“三仲”的诗词、孔毓圻的书画、孔尚任的戏剧等,都是这些涓涓细流中的一部分。它们虽然各擅胜场,但都为儒学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共同构成了儒学丰富多彩的谱系。孔氏家学对官方儒

<sup>①</sup>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议》(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以刘歆立古文诸经为正宗并增置博士为因,以为“有了刘歆,才有古文经学”,并认为“刘歆是古文学的开创者”。此种观点亦值得参考。

学的丰富补充作用具体体现如下。

首先,对儒家哲学的丰富补充作用尤为突出。自孔子以降,至清代之际,在剔除孔子、孔安国、孔颖达等的著作后,孔氏家学中儒家哲学的著述仍多达250余部。其中,经类著作独占鳌头,达180余部,四书类紧随其后,近50部,而《孝经》与《尔雅》类著述亦近20部。这些著述不仅拓展了儒家哲学的广度,更深化了其内涵,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这些著作中,不乏对儒学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例如,子思的《中庸》虽原本只是《礼记》的一部分,其所阐述的心性之学却成为理学的重要依据。朱熹更是将《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使其后来成为官学书籍和科举考试的指定内容,对南宋及之后的儒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如,秦孔鲋的《孔丛子》一书,翔实记录了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以及孔鲋等人的言行,“在叙事说理中,引用了大量的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材料,涉及到《尚书》《诗经》《墨子》《春秋经传》《吕氏春秋》等传世文献,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失传的历史文献及相关材料,对于补正上述文献流传中的讹误及佐证、纠正时人的某些研究结论,以及儒学思想史的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sup>[8]</sup>。成书于汉魏时期的《孔氏家语》则详细记载了孔子的言谈行事,其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极为显著。有学者甚至高度评价其地位,认为其“价值绝不在四书之下,完全可以称得上‘儒学第一书’或‘孔子文化第一书’”。<sup>[9]</sup>李学勤在《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语》一文中强调,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孔丛子》《孔氏家语》等孔氏家学著作,对于解开经学中的诸多重大谜题,无疑是一把关键的钥匙<sup>[10]</sup><sup>60</sup>。由此可见,孔氏家学在儒家哲学领域的补充作用不仅体现在数量的丰富上,更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对儒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其次,对儒学史的丰富补充亦不容忽视。诸如《子思子》《孔丛子》《孔氏家语》等子书中,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材料,还涵盖了部分失传的历史文献,为儒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阙里祖庭纪》《东家杂记》《阙里志》《幸鲁盛典》《阙里文献考》等众多史学著述,详细记载了儒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几乎涉及到儒学史上所有的重要人物,辑录了众多儒家杰出人物的传记,为儒学思想史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其中,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堪称其中的佼

佼者。这部百卷巨著,系统梳理了孔氏世系、林庙、祀典、世爵职官、礼乐、祀田、学校、山川、宗谱、孔氏著述、艺文等十六个方面的衍变历史。其内容涵盖了典章制度、人物传记、名言轶事、重大事件、儒学传承变迁及重要文献的渊源影响等。每部分均冠以“考”字,彰显史料的严谨与准确。每卷叙事则仿效《史记》,既生动形象,又详略得当,卷末的“述曰”则类似于《史记》的“赞曰”,用以总结评价。《阙里文献考》内容丰富,广泛征引传世及碑传文献,被誉为阙里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周洪才先生曾赞誉其曰:“固然属于孔氏家乘,但其中的内容实关系到全国各地、历朝历代,堪与正史、邑志印证发明、互资为用。”<sup>[11]</sup>可见它不仅是研究孔氏家族历史的核心资料,更是探讨儒学与历代政治关系变迁、国家释奠制度、儒家学术史乃至历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参考。众多著述如《续通志》《四库全书考证》《隋书经籍志考证》《山东通志·艺文志》等,均曾援引该书作为权威资料。

再次,为对儒家礼乐思想及艺文观念提供了丰富的补充资料。诗礼传家作为孔氏家学的核心理念,不仅传承了浓厚的诗教观念,强调诗文应明道言志、中和典雅,更因祭祀先师孔子为孔氏家族之重任,孔氏子孙对祀典礼乐的研究与实践尤为深入。在曲阜阙里,儒家礼乐制度得以传承,其中诗、礼、乐、舞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同时,孔氏子弟积极践行“诗礼之教”,创作了大量记述祭孔礼乐的著述和艺文作品。据统计,孔氏家学中经部诗礼乐类著作达70余部,子部艺术类著作80余部,集部诗文著作更是高达650余部。这些丰富的著述和作品,为儒家礼乐思想、艺文观念及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阙里文献考》《阙里志》《阙里祭仪录》《文庙乐舞全谱》等文献详细记载了祭孔祀典中所使用的礼器、祭品、乐器、乐舞、歌(乐)章等内容,同时还保存了大量碑刻、颂赞、祭文、辞赋等珍贵资料。这些文献无疑为研究孔庙祭祀和儒家礼乐制度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对于深入理解儒家文化的内涵和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三)孔氏家学在儒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修正作用

所谓修正,即通过修改使事物回归正道。司马迁《史记》言孔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唐张

守节正义曰：“郑玄云：‘鲁哀公十一年。是时道衰乐废，孔子还，修正之，故《雅》《颂》各得其所也。’”<sup>[12][31][15]</sup> 鲁国道衰乐废，于是孔子返回鲁国后修正之，使鲁国重新走上礼乐正道。张守节正义正是使用了“修正”一词的使遵行正道的意思。魏晋之后，儒学、佛教和道教三足鼎立，儒学开始相对衰落。尤其在南北朝时期，儒学分为北学和南学两派。北学坚守传统，笃守师说；而南学则受到玄学的影响，词腴繁芜，义无所凭。然而，南学所传学《易》《书》等多与孔氏家学有关。如皮锡瑞《经学历史》引《隋书·经籍志》言：《书》则“梁、陈所讲，有郑、孔二家”，《易》则“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等。郑玄、王弼虽综合古今文经，却又以古文经为主，而当时流传的古文经为孔氏壁出，因此，孔安国被誉为“古文家之祖”。这表明孔氏家学对南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孔氏家学恪守传统，传承孔子之道，不断修正南学中受玄学影响的成分，使其保持儒学的本色。所以，孔广森言“北方戎马，不能屏视月之儒；南国浮屠，不能改经天之义”<sup>[13][36]</sup>。

唐时，尽管儒释道依然并存，韩愈、李翱等被后人认为开了宋学（理学）之先声，但儒学定鼎于孔颖达《五经正义》。孔氏家学在其中发挥了修正儒学异数的作用，确保儒学不偏离孔子之道的轨迹。宋以后，理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经学也沦为表达理学思想的工具。尽管如此，孔氏家学依然坚持传承孔子之道，起到了保留孔子之道火种的作用。至清代，众多儒学家重回“六经”，倡导圣王之道，经学得以复兴。这离不开孔氏家学数百年的坚持与修正，其贡献在儒学发展史上不言而喻。

实际上，在儒学漫长而曲折的传承历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离初衷和异化的现象。然而，孔氏家学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到的学术洞察，总能及时捕捉到这些偏离和异化，进而进行精心的修正和调整。孔氏家学对儒学的修正作用，绝非仅限于对经典文本的精准诠释和规范，更在于对儒学精神内核的深入理解和坚定守护。这种对儒学本源的坚守与传承，是孔氏家学最为宝贵的品质。正是有了这种坚守和修正的精神，儒学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保持其纯正性，历经千年而

不衰。

综上，孔氏家学在儒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贡献深远而持久。孔氏家学不仅为儒学提供了稳固的基石和源源不断的滋养，更在儒学前行的道路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修正作用，使得儒学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始终保持其独特魅力和生命力。孔氏家学的这种支撑、补充和修正作用，不仅体现了孔氏家族对儒学传承和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彰显了儒学自身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总之，孔氏家族素享“天下第一家”之美誉，其家学传统极具代表性，且其影响已远超越家族之界。深究孔氏家学传统，可收“一叶而知秋”之效，这对于孔氏家族的研究，乃至其他家族家学或家学与儒学互动关系之探讨，均具不容忽视的价值。

#### 参考文献：

- [1] 刘蔚华. 孔子故里著述考序一[M]//周洪才. 孔子故里著述考.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
- [2] 桑兵. 理学与经学的关联及分别[J]. 史学月刊, 2020(5).
- [3] 蔡方鹿. 朱熹经学与宋学[J]. 社会科学研究, 2003(5).
- [4] 张岂之. 中国思想史[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
- [5] 皮锡瑞. 经学历史[M]//吴仰湘. 文献丛刊.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6] 王国维. 史记所谓古文说[M]//谢维扬, 房鑫亮. 王国维全集(第八卷).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
- [7] 蔡自珍. 大誓答问[M]//丛书集成新编(第110册). 台北: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 [8] 傅亚庶, 关秀娇. 论《孔丛子》的史料价值[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4).
- [9] 杨朝明. 《孔子家语》与中华文明研究新视野[J]. 孔子研究, 2023(5).
- [10] 李学勤. 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J]. 孔子研究, 1987(2).
- [11] 周洪才. 孔继汾与《阙里文献考》[J]. 山东图书馆季刊, 1992(3).
- [1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3] 孔广森. 戴氏遗书总序[M]//仪邦堂文. 上海: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1936.

##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 Part II )

Ji Yuzhen<sup>a</sup>, HUO Junguo<sup>b</sup>

( a. Library; b. School of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As a distinct symbol of Confucian way,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Firstly,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plays a significant support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From the time of Confucius to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nfucian learning had always been the foundation for Confucianism. Such descendent scholars as Kong Anguo and Kong Yingda have even inherited Confucian way, and devoted themselves to interpreting his doctrines, providing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Secondly, the works of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in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and the humanistic thoughts, have injected continuous vitality into Confucianism and enriched its connotation. Furthermore,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adhered to the tradition and corrected deviations in such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s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nsuring that Confucianism did not deviate from Confucian way. The revival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Qing Dynasty benefited greatly from the centuries-long perseverance and revision of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Key words:**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Confucianism;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Neo-Confucianism  
(责任编辑 陇 右)